



(Photograph by 摄影: Chan, Hin Io 陈显耀)

CHANGING CHINA: ENGAGING IN A DIALOGUE WITH MADAME DE AND MISTER SAI

改变中国：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对话

STEPHAN ROTHLIN 罗世范

鉴于中国的文化模式似乎深深扎根于“中原”特有的强大等级制度传统中，改变中国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业。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智慧和道德传统，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为它们经常被修正以实现社会进步。正如周守晋所记录的，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它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信念有关，绰号是“赛先生”（科学）和“德夫人”（民主），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民国时期，一个问题是儒家“君子”（道德高尚的人）的道德要求是否会简单地被一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方法所取代，或者是否可以在古老的智慧传统之间进行综合，并容纳一个民主和科学的世界观。因此，中国以合法道德权威的等级结构为基础的传统精神特质，由于多元化文明意识的觉醒和对不同文明之间真正对话的真诚愿望而得到丰富。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非欧洲人。他对中国的访问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它将亚洲的智慧传统与基于严格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强大改革动力相结合。正如周守晋所指出的，沿着这些路线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它激励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模范领导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顾重重阻力，坚持变革路线。当领导人很好地应对危机时，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Cristina Lu描绘了四位国际领导人，他们决心暂时牺牲自己国家的经济，对世界关闭国界，以保证本国人民的安全。虽然找到有效的领导力总是不容易——在Lu的样本中都是小国的政府首脑——但似乎至关重要的是要辨别“人性化领导力”的关键特征，即与儒家传统的君子之德相呼应的同情和明智的态度。

由于君子似乎自动与男性联系在一起，他们拥有统治家庭和社会的特权地位，因此，正如Dacy Zhao和Dennis McCann所认为的那样，考虑一下女性不仅可能和男性一样有能力行使君子的领导力，而且从君子理想中所包含的美德来看，女性甚至可能比男性更具有“人性化领导力”的自然天赋。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宣传性别平等，但在商业、政治和其他公共服务部门，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仍然明显不足。信心和动力确实是在机会出现时抓住它的关键，而不能因为害怕不够资格或担心自己的资历而退缩。作者们强烈要求女性鼓励她们的女儿实现自己的梦想，敢于成为领导者。事实上，中国对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的价值教育的强烈关注，让人们看到了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实现这种变化的希望。

面对冲突和战争的危机

与其他许多国家和文化一样，刻在中国人记忆中的是可怕的战争经历和彻底毁灭的威胁。考虑到几代人的痛苦和仇恨，以及经常性对复仇的深深迷恋，如何构想出任何积极的变化呢？由于一年多之前在乌克兰爆发的武装敌对行动，战争的幽灵更密集地将阴影投射到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上，我们可能更容易看到那些不顾一切致力于恢复和平的人的内在价值。Roderick O'Brien的文章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则之间的联系。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Henri Dunant）最初的提议有两个要素：在和平时期组建可以援助战争伤员的志愿者团体，以及达成一项保护伤员和志愿者免受攻击的国际协议。O'Brien指出，第二个要素即国际协议，为现代国际人道主义法则提供了基础。中国自清朝就开始参与这些条约，即1904年和1906年，并随着中华民国签署1929年公约而得到延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进一步延续，正式同意了1949年

的公约和附加议定书。自那时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一直是该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并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响应。这包括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军队内部广泛宣传国际人道法（IHL）。为了更好地协调和促进国际人道法在国内的实施，2007年还成立了中国国家国际人道法委员会，这是一个跨部委的机构。

在为一个破碎的世界带来和平的艰难过程中，宗教的作用往往被低估。在对哲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的分析中，Edmond Eh描述了从净化阶段到启迪阶段的精神道路，旨在规范家庭职责，同时使国家秩序井然，最终为世界带来和平。启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他人原有的性善状态，期待能人应给予人的启迪是引导他人走上修德的道路。在这个阶段学习的目的是利用自己善的知识为他人服务。那些能人学会运用他们的道德知识，关心家庭、国家和世界中的其他人，其首要任务是获得关于至善本质的知识，第二个任务是去实现至善。

Anton Jamni制定了各种宗教和信仰所共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代表了一种“全球精神”，即在包括商业在内的所有生活领

在民国时期，一个问题是儒家“君子”（道德高尚的人）的道德要求是否会简单地被一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方法所取代，或者是否可以在古老的智慧传统之间进行综合，并容纳一个民主和科学的世界观。因此，中国以合法道德权威的等级结构为基础的传统精神特质，由于多元化文明意识的觉醒和对不同文明之间真正对话的真诚愿望而得到丰富。

域的诚实和公正行为。这些原则的基础反映了对尊重人类尊严的深刻承诺。人应该永远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这条公理将西方和儒家的智慧传统以及黄金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通过尊重人的尊严，世俗和宗教的观点都可以分享公益导向。存在的快乐，拥抱生命中的真正的美，可以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实现（也就是对公益的追求），而不是在我们的孤独或务实的个人主义中实现。

面对中国改变耶稣的旨意

利玛窦（Matteo Ricci，公元1552-1610年）的行程，是一条逐渐掌握中文和获得新技能的道路，这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的新大门。正如梅谦立提到的“中国基督”这一发人深省的说法，利玛窦开始理解中国人经常举行的祭祖仪式的意义。在父母和祖先的牌位前，中国人实际上不是在崇拜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偶像，而是在表达他们与那些向他们传递生命、文化和道德准则的人的联系。然而后来，在利玛窦死后，这个问题——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成为一场持续数个世纪的冲突的焦点。但在梅谦立看来，利玛窦能够与他的中国朋友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并且通过这种交流，他在孔子的教义中以及中国的道德和文化理想中遇到了“中国的基督”。利玛窦不仅是一位研究中国和中国语言的伟大学者，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切的同情，这也导致了他自己的自我转变。通过发现“中国的基督”，利玛窦丰富了自己对基督的体验，并能够将其传达给其他人。梅谦立回忆起利玛窦鼓舞人心的形象，利玛窦写道，他在中国还不是收割的时候，甚至不是播种的时候，而是穿越森林的时候。在另一个场合，他写道，判断耶稣会士的传教工作是否成功，不应该只看基督徒的数量，而应当看他们为长期事业建立的基础是否牢固。

沿着让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扎根的思路，Anna Mahjar-Barducci在反映福音和教会社会教义的关键概念的基督教视角下，探讨了中文语言的细微差别。虽然她的解读可能是非常规的，但如果通过对语言学分析的狭义关注来看，它实际上可能为解决中国思想史上广泛争论的人性是“善”还是“恶”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根据中国哲学家墨子的说法，“人性本善”。但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他并不认为“人性本善”，而是说“人性向善” (human nature is to the good)。哲学家荀子则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邪恶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救药的。荀子说，人将通过克服其本能来征服天空。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分析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斗争的戏剧性，他有点类似于墨子和孟子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被召唤去做善事，并且急切地想要去做。但与此同时，以一种让人想起荀子的方式，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会受到与行善相反的冲动所驱使，走利己主义和暴力的道路，在明明知道自己在与上帝和他/她的邻居作对的情况下，只做他或她想做的事情。这种矛盾每天都在发生。在这种矛盾里，从Mahar-Barducci在信仰中提供的基督教视角可以知道，必须出现一种救赎。

即使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们也不能进入餐馆或离开隔离酒店，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基于深色皮肤的潜在歧视行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充分评估新冠疫情在多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和非洲的文化对话。据统计，在2020年期间，只有几千名非洲人居住在广州，这与2005-2012年的高峰期相比急剧下降，要知道当时广州是亚洲最大的非洲侨民社区。按照从新冠疫情时期尤其痛苦的时期中汲取教训的Lam重要案例研究，我们需要关注使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互利的标志，不仅是在商业交易方面，而且要在充分抗击众多疾病的方面。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在我们与新冠疫情的长期斗争中出现了一个机会，是关于澳门老区的旅游推广活动。Eric Mou带领我们来到名为“*Rua dos Ervanários*”（关前正街）的街道，这是澳门最古老的中国海关边境地区。那里现在是一个有许多老建筑、商店和小餐馆的地区。这样的地区一直吸引着许多游客；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游客的数量急剧下降。这些商店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挑战，一些店主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关店。基于以前的社区工作经验，一个当地协会将手机上的photo games概念与幸运抽奖相结合，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游客

启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他人原有的性善状态，期待能人应给予人的启迪是引导他人走上修德的道路。在这个阶段学习的目的是利用自己善的知识为他人服务。那些能人学会运用他们的道德知识，关心家庭、国家和世界中的其他人，其首要任务是获得关于至善本质的知识，第二个任务是去实现至善。

中国南方进行中的社会创新

2020年，在新冠疫情危机的高峰期，中国确实面临着非洲联盟和美国的指控，指其在广州存在虐待非洲和非裔美国公民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Kaian Lam回忆说，

到这个地区。奖品包括区内商店的折扣券和澳门的大型度假村赞助的礼品。由于更多的商店愿意加入该项目，主办方将该项目延长了两次，一直延长到2022年10月，甚至有些已经关店的店主现在也想再次租赁他们的商店继续经营。这一试验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涉

及社区、澳门政府和人民的发展平台，提出创新的建议，帮助他们度过由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随着游客重返澳门，这样的平台可能会创造机会，有望使澳门的整体景观多样化，减少当地经济对赌场的过度依赖。

前面的路

在考虑可能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各种因素时，我们的思考往往集中在2021年5月至2022年7月的依纳爵年的路线上。耶稣会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探讨了一些生活故事的关键因素，这些故事完全改变了两位朋友的生活，即依纳爵·罗耀拉（公元1491-1556年）和弗朗西斯-沙勿略（公元1506-1552年）。他们对欧洲文艺复兴完全开放精神的大胆回应，不仅使他们自己，而且也使其他许多人沿着同样的路线跨入了“新世界”的大门。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他们和他们的弟子今天都在追随弗朗西斯-沙勿略的道路，他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摩鹿加群岛穿越亚洲，最后在中国南方广州下面的上川岛的一块贫瘠岩石上结束了他的旅程。因此，MRIJ与中国的对话从沙勿略的大胆设想中获得了自己的灵感，并会继续把对话作为与亚洲众多文化对话的出发点，尽管也存在风险和精神上的危险。在今天看来，当时在与中国的对话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下，本期作者的各种见解清楚地表明，我们迫切需要继续并深入进行互惠互利的交流。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